

主 歸 華 中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

中華歸主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一九〇一——一九二〇)

中華歸主

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编辑主任 司徒敦

副主任 王振芳 都立华

调查特委会委员长 罗炳生

委员	鲍咸昌	比必	文显理	鲍引登	诚敬一	全绍武	德教治	傅乐仁	唐布
	贾腓力	江长川	戈德白	卢依士	李耀邦	路思义	罗运炎	慕维德	金扶济
	柏高德	麦乐义	毕德辉	毕嘉乐	饶柏森	乐灵生	施伯珩	吴德施	司徒敦
	师德克	郑和甫	董景安	朱友渔	苑礼文	温佩珊	余日章		

翻译

蔡詠春

文庸

杨周怀

段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二月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8—1921

Milton T. Stauffer, B.A., B.D.
Secretary and Editor

Assisted by

Tsinforn C. Wong M. Gardner Tewksbury, B.A.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E.C.Lobenstine (Chairman)

Y. H. Bau

R.C. Beebe, M.D.

G.H. Bondfield, D.D.

C.L. Boynton

C.Y. Cheng, D.D.

S. Peter Chuan

George Douglas, M.A.

Henry Fowler, L.R.C.P. & S.

F.D. Gamewell, D.D., LL.D.

G.W. Gibb, M.A.

J.A.O. Gotteberg

Z.T. Kaung

John Y. Lee, Ph.D.

Bishop W.S. Lewis, D.D., LL.D.

R.Y. Lo, Ph.D.

H.W. Luce, M.A.

A.R. Mackenzie, M.A.

Lacy I. Moffett

Rt. Rev. H.J. Molony, D.D.

J.T. Proctor, D.D.

C.E. Patton, M.A., D.D.

W.W. Peter, M.D., Ph.M., C.P.H.

Frank Rawlinson, M.A., D.D.

C. H. Robertson, B.S., M.E.

Rt.Rev. L. H. Roots, M.A., D.D.

C.G. Sparham

James Stark

M.T. Stauffer

Tong Tsing-en

Lindel Tsen, M.A.

Y.Y. Tsu, Ph.D.

A.L. Warnshuis, M.A., D.D.

S.T. Wen

David Z.T. Yui, M.A., Litt.D.

出版说明

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均问世于1922年，英文版题名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基督教占领中国》），中文版题名为《中华归主》。这样的书名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未曾被基督教“占领”，中华也未曾“归主”。出版者当时使用这个书名，只是反映他们的一种主观幻想。但是这个书名已为人们所熟悉，现在本书按1922年的英文版重新译成中文出版，我们仍袭用《中华归主》的书名，无非是不让读者误会它是另外一部什么书。

当时负责编纂与出版这部书的是“中华续行委员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这是基督教新教在我国创办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13年。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是美国基督教著名活动家穆德（John Raleigh Mott, 1865—1955），当时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的总干事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1913年他在中国召集基督教各个差会的领导人开会，由他任大会主席。他为了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在会上号召各个差会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有关的中国国情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大会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华续行委员会”，经过多年的筹备，1918年秋在这个组织下面设“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进行实际调查，历时三年多，终于编成了这部书。担任主编的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干事、美国传教士司德敷（Milton Theobald Stauffer）。

情况调查的年限是本世纪最初二十年（1901—1920），在内容上以基督教各个教派为主，但也包括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一些情况。这期间中国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1900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西方组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等地，对我国肆意劫掠蹂躏，逼使清廷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我国进一步沦入受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宰割的境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已极的清朝政府，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篡夺，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增无已。1919年的五四运动吹响了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方兴未艾。这二十年的国际形势也有重大发展，工业革命使西方列强（尤其是英、美）力量骤增，对殖民地的掠夺与争夺更加猖獗。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引起西方列强的巨大惊恐，它们增强了图谋扼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力跃居西方之首，开始俨然以头等强国自居。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历来与西方殖民主义紧密联系的基督教传教事业这时也增添了活力，在美国尤其如此。

早在1888年底，刚从大学毕业的穆德就创立了称为“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对外传教组织，获得了不少追随者。这个组织在1894年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会议上，提出了“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中国在他们要“征服”的世界中名列前茅。穆德本人更是把眼睛盯住中国，并多次前来我国活动。美国总统威尔逊对穆德的能力很赏识，他在1913年2月写给国务卿布赖恩（William Jeanings Bryan）的信

中,提出想让穆德留在中国任驻华大使,这是西方政治家高度重视传教事业的又一证明。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赞助下,这二十年中基督教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教徒人数从八万多增至三十六万多,天主教徒也从七十多万增至一百九十多万。穆德等人为这一形势所鼓舞,决心奋力发展传教事业,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华归主”的幻想。这部题名为《中华归主》的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它一方面是为了让传教事业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为自己树立的一块庆功碑。在指出基督教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政策相联系的同时,当然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不居领导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并没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的动机,他们曾经做了对我国人民有益的事情。

尽管这部书的出版意图是为了促进符合西方列强需要的传教事业,书中的观点也常有严重错误,但是它在客观上却为我们保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鉴于本书在我国已所剩无几,研究人员很难从图书馆借到手并加以利用,于是决定重新出版,在内部发行,以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再则,本书英文版原有的篇幅很大,又有各种图表八百余幅,可是旧的中文版删略太多,又是用文言文表述,时过境迁不少地方不注释就很难看懂,对读者都很不方便,因此根据英文版重新作完整的翻译是完全必要的。

本书的补译部分是蔡詠春教授的遗作,他生前为翻译本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译文妥贴流畅,颇为难能可贵。旧中文版的内容则由文庸同志重新译了一遍,他还主持了本书总的编辑工作,杨周怀和段琦二同志也承担了一部分翻译工作。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孟源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关怀和协助,在翻译过程中也得到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的热情指教,谨此致谢。

高望之

1985年1月

汉译新版序言

这部书为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制，全中国各基督教差会会长和干事，还有一百五十多名通讯员费了几年功夫，详细调查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全书主文第三编为例，详细调查了各省的行政区域、面积、里数、边界、城市、人口、地势、山川、民族、语言、气候、物产资源、经济状况、水陆交通、邮电、学校、医药设施等等以及传教历史和教会活动情况，调查材料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

这部书的英、汉文本不同。英文本有导言、序言、正文十四编、附录九篇、索引一篇。原汉文本只有正文六编（把第三编分为两编，名为七编）、附录三篇。汉译本对照英文本，文字有删削和改动。这部书是了解1921年前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我曾想研究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问题，由我以个人名义请蔡詠春先生翻译原汉文本未译部分。蔡先生译出正文第八至十二编、附录一篇后，因去东北任教，停止翻译。1956年，蔡先生又翻译了第十三编，可惜又因故停笔了。蔡译稿一直由我保存在近代史资料编辑部。十年浩劫，编辑部受了损失，幸好此稿无恙。前几年我与任继愈同志商议，把蔡译稿交给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最近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人力校订旧译本和蔡译稿并补译了未译部分和删削部分，订正了改动部分，又重新修订了全部译文，为保存和流传这部历史资料付出了很大的气力。因本书汉译本曾经出版过，这次印刷应说是校订重印；但是过去的汉译本只有全书的一半，这次全书译为汉文则是第一次出版。出版这部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资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应当庆祝，应当感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为本书尽力的同志们。叫我写序，我写不了，只能把我经手的事情向大家汇报并把这份近代史资料推荐给大家。

荣孟源 1985. 1. 25

宣教会工作的定义

“某一地区的基督教宣教能力（无论是外国差会、地方教会或两者都有），凭其人力、地理位置、宣教方法及灵性活力，在上帝的祝福下有可能：（一）在适当的时期内建立一所地方教会，通过这所地方教会的生活和工作来宣传基督教，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二）通过与地方教会合作，把基督明确全面地介绍给每一个人，使每个人有责任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福音。虽然事情都有先后之分，但上述二者之中，过分强调其一必然削弱其二，并且必然会引起宣教活动的混乱，导致宣教活动失调。两者都是我们的同样重要的目标。”

罗伯特·斯皮尔 (Robert E. Speer)

导 言

这项调查工作是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普世宣教会议（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上提出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宣教运动的领袖们确信，各差会单独活动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过去他们单独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13年，穆德博士（Dr. John R. Mott）访问中国并主持了一系列会议，会议使各国传教士及中国职员们更加深信，正在成长的中国基督教团体要想成功地应付教会在各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利用目前的时机，最根本的是要有明确的统一计划和有效的合作。

在五个地区会议上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本地区的教会有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宣教计划？”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会议上曾经宣称：“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的调查和讨论清楚地表明，各差会本部和地方教会人士要想明智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计划，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足，收集这些资料极为复杂，并且需要有全面了解一切基本事实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在1913年全国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明确了进行调查的必要性。调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任务由全国会议委托给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立即组织了几个特别委员会着手研究基督教工作中的特殊问题。研究的课题每年各不相同，特别委员会一直坚持工作，在了解实际情况和提出发展计划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这些特别委员会中有一个是调查与宣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从调查西南各省的宣教事业入手的。值得庆幸的是这项工作得到了托马斯·科克伦先生（Mr. Thomas Cochrane, M. B., C. M.）的帮助。科克伦先生是调查中国宣教事业的先驱，他写的关于中国宣教事业的专著最近刚刚出版。这次调查的结果与1915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年度报告一同出版并已广泛流传。这个调查报告使人们对西南各省的宣教工作再次发生兴趣，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华国内布道会（Chinese Home Missionary Society）选择云南省作为它的第一个宣教地，这个组织已经引起了中国各宗派基督徒的浓厚兴趣。

中华续行委办会也开始收集中国各宣教差会的一般年度报告，同时也收集在差会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教会的年度报告。这种收集工作早就开始了，个别传教士就收集过早期的会议报告。季理斐牧师（Rev. D. MacGillivray, D. D.）编写《中国差会百年史》（A Century of Missions in China）也收集了教会年议会报告。这套书由他和其他一些人每年出版一次。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大多数传教士对这项工作漠不关心，无法找到确切的记录资料，致使他煞费苦心地把各差会的同类统计资料收集到一个标题下，结果竟往往是徒劳无功。

1914年爱丁堡会议续行委办会出版的统计报告为本调查报告奠定了基础。该统计报告中有一份选好了的统计项目表，用来收集世界各地宣教会的统计数据并给各统计项目

下了定义。

中华续行委办会采用了上述统计表中的一些项目作为中国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又增加了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推荐的几个项目。希望其他国家也采用这份调查表，这样取得的资料对各国都有价值。调查委员会请鲍引登牧师（Rev. C. L. Boynton）作统计干事，负责回收寄往全国各差会团体的统一调查表格。鲍引登牧师在这项工作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16，1917，1918年的《中国教会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上年年都发表他的统计材料。可惜，鲍引登牧师后来担负了其他工作，致使统计资料的出版一度中断。最后，他又离开了调查委员会。附录八中有他最后收集的（1920年）统计数字。

1916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年议会认为准备工作已逐渐就绪，可以开始1913年全国会议上建议的普遍调查工作。当时本调查委员会认为没有设置专职人员的必要，以致拖了两年之久为本书收集资料的工作才真正开始。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在调查委员会和鲍引登牧师的影响下，一些在华传教士向我们提供了大批详尽的报告资料，同时，已故的芬德利牧师（Rev. W. H. Findlay）也为本调查委员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那时他正在计划去印度进行考察。

直到1918年春天这次调查工作才正式开始。执行委员会委托了总干事，并向他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力以保证工作进行。

调查工作是在调查委员会指导下进行的，除委员会主席和总干事没有变动外，曾经参加过本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有：

罗炳生牧师（Rev. E. C. Lobenstine）（长老会）中华续行委办会执行干事，本调查委员会主席，1918—1922。

司德敷牧师（Rev. M. T. Stauffer）（美国归正教会）干事，1918—1922。

鲍武昌（Y. H. Bau）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19—1920。

比必牧师（Rev. R. C. Beebe, M. D.）（美以美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执行干事，上海，1918—1922。

文显理牧师（Rev. G. H. Bondfield D.D.）大英圣书公会驻华代表，上海，1918—1920

鲍引登牧师（Rev. C. L. Boynton）中华续行委办会统计干事，上海，1918—1920。

诚敬一牧师（Rev. C. Y. Cheng, D. D.）中华续行委办会执行干事，上海，1918—1922。

全绍武（S. Peter Chuan）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归主运动文字干事，上海，1921—1922。

德教治硕士（George Douglas, M. A.）（苏格兰长老会）东北辽阳，1918—1919。

傅乐仁（Henry Fowler, L. R. C. P. & S.）（伦敦会）中华麻疯救济会远东干事，上海，1918—1920，1921—1922。

- 贾腓力牧师 (Rev. F. D. Gamewell, D. D., Ph. D., LL. D.) (美以美会)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总干事, 上海, 1918—1922。
- 唐布牧师 (Rev. G. W. Gibb, M. A.) 内地会中国理事会副主席, 上海, 1919—1921。
- 戈德白牧师 (Rev. J. A. O. Gotteberg) (湘中信义会) 湖南长沙, 1919—1920。
- 江长川牧师 (Rev. Z. T. Kaung) (监理会) 江苏苏州, 1919—1922。
- 李耀邦 (John Y. Lee, Ph. D.)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文字部执行干事, 上海, 1919—1922。
- 卢依士会督 (Rev. Bishop W. S. Lewis, D. D., LL. D.) (美以美会) 上海, 1919—1920。(已故)
- 罗运炎牧师 (Rev. R. Y. Lo, Ph. D.) 《兴华报》(Chinese Christian Advocate) 主编, 上海, 1921—1922。
- 路思义牧师 (Rev. H. W. Luce, M. A.) (长老会)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副总干事, 上海, 1918—1919。
- 金扶济牧师 (Rev. A. R. Mackenzie, M. A.) (苏格兰长老会) 东北兴京, 1919—1922。
- 慕维德牧师 (Rev. Lacy I. Moffett) (长老会) 中华归主运动干事, 上海, 1918—1920。
- 麦乐义会长 (Rt. Rev. H. J. Molony, D. D.) (英圣公会) 浙江宁波, 1919—1920。
- 柏高德牧师 (Rev. J. T. Proctor, D. D.) (美浸礼会) 华东浸礼会差会干事, 上海, 1918—1920, 1921—1922。
- 毕嘉乐牧师 (Rev. C. E. Patton, M. A., D. D.) (长老会) 长老会中国理事会代理主席, 上海, 1921—1922。
- 毕德辉博士 (W. W. Peter, M.D., Ph. D.) 中华卫生教育会 (Council on Health Education), 上海, 1921—1922。
- 乐灵生牧师 (Rev. Frank Rawlinson, M. A., D.D.) (南浸礼会)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主编, 上海, 1919—1920。
- 饶柏森 (C. H. Robertson, B. S., M. E.)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科学普及讲座主任, 上海, 1921—1922。
- 吴施德牧师 (Rt. Rev. L. H. Roots, M. A., D.D.) (美圣公会) 湖北汉口, 1918—1922。
- 施伯珩牧师 (Rev. C. G. Sparham) (伦敦会) 伦敦会中国理事会干事, 上海, 1920—1922。
- 师德克 (James Stark) 内地会中国理事会干事, 上海, 1918—1920。
- 董景安牧师 (Rev. Tong Tsing-en) 沪江大学代理校长, 上海, 1920—1921。

郑和甫会长 (Rev. Lindel Tsen, M.A.) 中华圣公会, 差会本部总干事, 安徽芜湖, 1919—1920。

朱友渔牧师 (Rev. Y.Y. Tsu, Ph. D.) 上海圣约翰大学, 1918—1920。

苑礼文牧师 (Rev. A. L. Warnshuis, M.A., D.D.) (美国归正教会) 中华续行委办会全国宣教干事, 上海, 1919—1921。

温佩珊 (S. T. Wen) 江苏南京, 1919—1920。

余日章 (David Z. T. Yui, M.A., Litt. D.) 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总干事, 上海, 1918—1919, 1921—1922。

对照在印度局部地区进行详细调查的计划, 慎重权衡在全国调查研究一般情况的利弊之后, 从而感到教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只能根据全国的情况来寻找答案, 对全国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或许比对某一个省的调查更容易一些。这种调查不仅包括全国范围的情况, 而且可以对同时期的概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关于收集实际数据的决定是在与北京、广州、上海等重要城市以及正在避暑地休假的中外职员广泛讨论后作出的。对于提出的每一个项目都问了两个问题: “是否有必要进行一次调查?” “能否获得关于全国的准确情况?” 事实上, 当时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某些数据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此有些本应包括在内的项目就被删去了。其中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项目, 如外国经费的使用以及教会自养问题。教会自养问题的初步调查可在中华续行委办会年度报告中见到, 但是必须注意, 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真正的进展, 要想就如何使用国外捐款方面制订管理原则借以保证它们可以更快地建立起一批坚强的本地自传教会的问题取得一致看法, 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中华续行委办会和其他组织编印的一些有关宣教工作捐款的统计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则因为实例太少, 二则因为在同一个项目下往往有许多不相干的开支, 必须加以分析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

本调查委员会决定这份调查报告的任务主要是讲述事实, 而不对这些事实做任何解释与评论。对这些事实做出解释确实是十分困难的。需要集思广益,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需要对国内外情况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充分认识和评论这些事实。此外, 本调查委员会认为要想对事实做出解释, 首先必须对全国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种了解尽可能用统计数字来表示, 然后才能判断整个基督教运动的得失, 判断各种工作方式的价值。

在调查报告中, 我们尽力避免陈述事实时受某种教会理论或宣教政策的影响。我们时刻牢记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尽量收集可靠的事实资料, 防止任何偏见, 在事实根据不足时, 必须请有资历的人给以慎重的估计。同一资料在各方面反复使用, 一方面可以检验其准确性 (这样更容易发现其错误), 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对事实的研究,

本书中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的收集、分类、编辑工作主要是调查委员会总干事司德敷牧师承担的。他是美国归正教会厦门宣教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1910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又于1913年毕业于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做了几年牧师工作后, 他决定为担任差会主席工作而深造, 于是进组黑文耶鲁大学的 Day Missions Library 在比奇牧师 (Rev. Harlan P. Beach, D.D.) 指导下进修了一年。

1916年春,司德敷作为宣教会的一名研究人员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的全部时间都致力于中华续行委员会的工作,前两年他主要是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做一般调查工作。1918年5月他被选为本调查委员会干事,从此以后他就专力从事本调查报告工作。调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干和他对这项工作的浓厚兴趣,他深信这些调查资料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差会和中国教会正确掌握现实情况和制定合理的宣教政策是必要的,中国教会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为自己培养未来的领导人才。

司德敷牧师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稍微缺乏信心和耐心的人都会灰心丧志,而他却安心地工作了四年之久,做了大量的通讯联系工作,抓住每一个线索或机会来搜求资料,核对从各地寄来的无数报告,协助准备各种表格、地图、图表,并写了很多详细的文字说明。

司德敷牧师在全中国征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并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用自己调查工作精神价值的信念感染他们。从本调查报告酝酿开始到后来考虑用什么形式发表这批资料,调查委员会都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调查报告的范围,资料的编写方法等大部分工作都由委员会干事在主席的经常协助下负责决定。

这次调查在经济上是全凭信心维持的。开始工作的时候,调查委员会对这项工作需要多少经费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筹集这笔款项。从1918年5月1日到1919年10月1日的经费是由中华续行委员会的日常经费中开支的。此后,从北美世界教会运动(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 of North America)、纽约社会与宗教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and Religious Surveys in New York)和伦敦督导会(Survey Trust of London)先后得到了大批捐款,调查工作才有了完成的可能性。北美长老会慷慨地负担了都立华先生(Mr. M. Gardner Tewksbury)的薪水,北美浸礼会华东差会委派陆士寅(Z. Y. Loh)牧师为本书中文编辑。

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目标如下:

一、收集情况并摘要发表,以使差会负责人士能够具体了解各差之间的工作关系;能够更好地支配本差会的人力物力;帮助他们在全国各差会工作方面取得更有效、更加协调与平衡的发展。

二、找出未被任何宣教会认为责任地的地区并划定其界限,同时也指出那些虽已被认为责任地但至今尚未开展宣教工作的地区。

三、根据人口和单位面积论述全国宣教工作的现状,根据各地具体需要提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宣教工作。

四、激发中国基督徒对国内宣教工作的更大热情和更深厚的责任感;通过描述外国传教士人力不足无法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宗教需要以激发起中国教会的极大宣教热情,适应目前任务的艰巨性和迫切性。

本调查的目的始终是十分实际的。我们试图以国家生活为背景把基督教(新教)运动的主要问题阐述清楚,致于效果如何,应该由别人来评说。

本书的第一部分叙述了今日中国的概括情况,包括教会所处的环境和教会的内部情

况，这样，既为详细研究基督教的特定工作项目提供了背景材料，也为研究中国各种特设宗教组织或会道门提供了背景材料。

本书差不多用了二百四十页的篇幅（指原文——译者）一省一省地详细研究了基督教教会的发展情况。在这一部分里集中了各差会寄给本调查委员会的大部分资料。每一个教会的工作都是与本省其他教会的工作联系起来陈述的，同时也详细叙述了教会的各种活动、传教工作的范围、医药工作、慈善事业、教育设施以及领导人才的培养。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将上述事实重新加以组织，以便于进行不同省份、不同差会、不同民族的比较。第三章中关于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对比可能较少一些，但第五—八章是研究了一些省的情况后进行的更大范围的比较。最后一部分则是使读者对基督教团体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能够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发展的重要性。对基督教团体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负责指导中国基督教工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对教会的前途负有重要责任。

回顾这些情况使人大受鼓舞。基督教会一直在稳步前进。它的工作范围逐年扩大。自1900年以来，差会总堂的数目已经增加了一倍多。这表明这些城镇经常能够直接听到基督的福音，也表明教会的宣教工作正在稳步前进。

教会教育工作也在向前飞跃发展。二三十年以前，大多数宣教会对于发展高等教育工作还举棋不定，他们满足于本教会学校中的教职员所受的不多的教育工作训练；现在这种教务政策显然是不合适了，一方面教会应当对它的青年人进行基督教教育，另一方面教会应当同时兴办大、中、小学校系统，其教育质量不应亚于国立学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会有好的领导人才，这是与教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更使人瞩目的是中国基督教团体内部的变化。教会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意识到了自己拥有对全国来说至关重要的福音和生命。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最值得注意的大事，本书所提供的全部情况都应该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通过为数不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那些从高等学校毕业或留过学的男女青年职员，教会已经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表现自己。虽然这样的领袖人物目前还很少，但其人数和影响确实是在与日俱增。

在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发表本调查报告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这次会议对教会生活来说可能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旧时代，差会基本上控制着局势，教会工作主要由传教士创立并推动。新时代是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教会工作的重担将逐渐从外国传教士肩上转移到中国职员的肩上。中国基督教徒中逐渐增长的民族意识使一些精干的献身教会事业的人对目前的某些情况感到很大的不满。他们强烈希望基督教从所谓“洋教”的魔网中挣脱出来，不允许西方各宗派在中国各自为政的现象永远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外国势力对中国教会的统治是基督教在中国迅速传播的主要障碍，也是许多教会软弱无力的间接原因。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青年最近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议论说：“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很有成绩，但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基督徒中建立起对教会工作的主人翁感。”他的话是对的，他指出了一种确实存在的可悲事实。今后几年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信徒中树立对教会的主人翁感，使教会真正成为中国的教会。

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中外双方都必须忍耐、克制。宣教政策需要调整，这就要对上帝的指引抱有更大的信心，特别是当中国教会方面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西方弟兄不一定认为是明智的措施的时候。

中国基督教徒强烈希望教会在中国的道德、精神方面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为此要求各派教会组织比以往更加密切合作。他们认为在困难面前大家应该站在一起，而当前的宗派分歧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合作的困难，甚至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这种现象在中国有所发展，在这次调查中也有反映，本书第六章的图解说明就指出了对将来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它们必不可免地涉及到“信仰与制度”问题。

很多基督教领袖都强烈要求教会与差会不要分裂，过渡期间教会与差会应该全力合作，对此我们深为感激。如果西方教会将来有机会向中国教会提供充分的捐助，只要中国教会不拒绝它所急需的捐助，这种合作是很必要的。

情况是很鼓舞人心的，中国教会已经“成长起来”，能够而且也愿意承担全部宣教工作。上帝要求我们前进，为他的国开拓更多的疆土。这需要有坚强的勇气和更大的信心。我们耳边好象响起了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话：

“希望上帝赐给伟大的事业，

为上帝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我们向读者奉献这份报告的背景就是这样。希望读者不要只看到一两件事实就急于做出判断，不要忘记应该先考虑一切因素然后再下结论。当然，有些事实本书没有包括进去，需要另外收集。本书提供的事实主要都是能够公布的数据。希望读者能够纵观全书，归纳研究，然后根据情况去解决与自己工作或自己教会有关的问题。

使人高兴的是最近完成的教育委员会报告和本书同时出版。那份报告清楚表明继本次调查之后所需要进行的调查。本书中已经列出了有关中国教育的情况，教育委员会无需再去亲自收集，因此，教育委员会可以把自己的调查局限于对典型教育机构的研究，但是由于已经全面了解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以及不同程度的教育机构的分布情况，所以也能够得出概括性的结论。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有深远的影响，一定会带来重要的变化，使教会教育工作比目前更有成效。本书是教育委员会报告的补充材料，不仅可以说明实施教育委员会建议所需要做的大量工作，而且可以使每个宣教团体估计出要使自己的工作纳入教育委员会建议的轨道所面临的任务。

如果中国教会能够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那么，就需要组织象教育委员会那样的由中外专门人才组成的各种委员会来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地进行一次充分的研究以探讨在目前条件下西方基督教会向成长中的中国教会能够提供的最大服务是什么，以及提供这些有效服务的最好途径。

最后，请读者注意，这次调查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友好的评论。本调查委员会清楚地意识到，由于无法收集到某些必要的资料而出现了一些疏漏并导致判断失误，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对于资料的选择与解说也来不及斟酌与更换，以及进行这项工作的内部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局限，都影响了本报告的精确性。

我们相信，即使读者发现了这些错误，也不会因此而否定本调查报告的价值，反倒会使有关人员认识到保存可靠资料的重要性，使他们将来注意保存那些与基督教会有关直接关系的事实，这些事实在一一定的时期内将有助于决定教务政策，促进教会目的的实实现。此外，在调查方法和使用资料方面也都可以得到改进。资料保存更加正规，数据更加精确，对制定教务政策和决定工作方法的影响也就会更加明显。

调查委员会主席

罗炳生 (E. C. Lobenstine)

序 言

进行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中国宣教事业的发展，并使之更有成效。本书所收集、发表的材料都与上述目的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次调查与其他考查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第一次对所有大宣教区进行的全面调查研究，在于它涉及到了在全中国传播基督教有直接关系的教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工作。本调查的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是要使中国基督教一致化，并提出各教区独具的特点，借以评价每个教区的宣教事业。因此，本调查与加速中国宣教事业的发展 和使之更有成效的目的有着一种先决的联系。为了使这种联系能始终贯穿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有时需要丰富的想象精神，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资料？”“这是些什么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或对我的宣教计划有什么影响？”

“这些工作能够拯救灵魂吗？”这些问题也许会使我们发生兴趣，也许会使我们感到困惑，但却不能使我们确信所提供的事实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的确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调查的范围限制了我们对主要目标的了解，也许通过其他方式能够了解得更充分一些。正如本书一开头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研究范围限于中国基督教事业的数量方面，即基督教在中国的势力大小及其地理范围。对质量问题涉及较少。然而这些质量因素对于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和功效，与数量因素具有同样深广的影响，甚至更为主要。因此，需要把这两方面的因素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来加以考虑。目前，有很多因素严重地影响着使中国福音化的速度与效果，如宣教方法，布道、教学、医疗等工作的质量，基督徒的见证，动员并训练中国基督教职员，教会的中国化，中外基督教职员间的关系，各个基督教团体与各种基督教活动之间的合作水平与联合情况，等等，等等。显然，对中国基督教势力的数量因素的研究只是为了进一步对上述各种质量因素进行研究而做的必要而初步的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本调查容忍这方面的缺点。调查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要局限于数量方面的研究。我们决心在整个报告中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各种事实，而不试图加以解释或褒贬。我们相信，如果不抱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能从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来着眼，不把这些报告单纯地当作一些消息，那么，这些报告中所反映的有关基督教势力大小的数字和基督教在地理上的势力范围，迟早会使那些最有资格的人就报告本身的质量好坏作出最好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质量方面的研究，而无数量方面的研究，就如同把房子盖在砂土上；没有事实作根据而提出的理论，则不过是臆测而已。

如果本调查委员会，特别是其中担任编辑的干事们，对从他们曾工作过多年的教会团体中所收集来的这些资料各自发表评论，那将是非常武断的和不明智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宣教会，具有不同的宣教观点，执行过不同的宣教政策，曾在不同的地区工作